

## 纪念

← (上接7版)

诣”，也是感觉到了孤独的不同情况。)吕先生的孤独，也许两者都存在吧。这种人生的苦涩和孤傲，使整个诗集充溢着沧桑感。正是这种深沉的悲哀，融铸了先生的诗魂。

《诗存》表现的真诚情感当然是个人的，但是，个人的情感，总包含有人类共性的内涵。只有这样，作品才能感人。一个没有真诚情感的人，能写就真正的诗吗？至少，我是不相信的。

**诗**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展现，同时也展现着诗人所处的世态现实。吕先生不仅是诗人，还是学者，在吕先生的《诗存》中，自然映现出先生所处的现实和世态人情。而其中不少学者间交往的细节，作为史料，对于研究当代的学术文化，不无补益。

在诗集中，充溢着先生对朋友的真情。如《次韵和效鲁见赠之作》所云：“盈颠白发两衰翁，三世论交感不穷。最是怕听邻笛奏，几抛酸泪哭欧公。”效鲁，指冒效鲁(1909—1988)，别号叔子，江苏如皋人，清初名人冒辟疆的后人。民国间，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，后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，是吕先生的挚友。“邻笛”，指向秀《思旧赋》“邻人有吹笛者，发声寥亮，追思曩昔游宴之好，感音而叹”的典故。哭欧公，指苏轼在欧阳修死后对他的思念，见所撰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，又有《哭欧公孤山僧惠思小诗次韵》：“故人己为土，衰鬓亦惊秋。犹喜孤山下，相逢说旧游。”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友朋情感的典故，在吕先生心中引起共鸣。

这种情感，除冒效鲁先生外，对于下面要谈到的叶恭绰、吴湖帆，还有其他友朋，也都如此。

先看写叶恭绰先生的诗。叶恭绰(1881—1968)，字裕甫(玉甫、玉虎、玉父)，又字誉虎，号遐庵，晚年别署矩园，祖籍浙江余姚，生于广东番禺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、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、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。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，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，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。上世纪60年代，受到冲击。去世数十年以后，才开的追悼会。吕先生为此写了诗。诗题很长，兼有小序的作用：

叶丈遐庵与寒家世谊弥笃。在中日战争之际，戊寅年间，贞与叶丈俱客香港。所居山顶，相距咫尺，朝夕过从。香港

为日军沦陷后，迫回上海。丈则闭门不出，画竹石以自娱。解放后，丈奉召赴京任职，并兼文史馆副馆长、国画院院长，居东城头发胡同。予每到京，必诣丈深谈。不幸在丙丁浩劫之中弃世，距今已十三年矣。今岁元宵节，北京书画院为丈举行追悼会。北地南天，相距甚远，未能临吊，惟有临风挥泪而已。微闻丈生前所珍藏金石书画等文物，亦俱散失殆尽矣，可叹可叹。丈在吴门置有别墅，榜题风池精舍，今亦鞠为茂草，慨叹何极。

诗倒不长：“劫运几能逃世网，寇深相与叹时艰。”(见卷十四，七十页)是说半个多世纪，历经刺激厄运，最后两句：“精舍风池余茂草，低徊赢得泪潺潺。”对叶家和“精舍风池”变迁的哀叹，颇堪回味。

有关近半个世纪的老友，一代画家吴湖帆的诗，更为感人。吴湖帆(1894—1968)，江苏苏州人，为吴大澂嗣孙，初名翼燕，书画署名湖帆。书画、金石、诗文俱佳，三四十年代与吴待秋、吴子深、冯超然并称为海上画派的“三吴一冯”。晚年在“文革”中受迫害，1968年8月11日，自己拔去治疗的导管，去世。

老友蒙冤去世，先生抚其残卷。1976年元旦后写的《检视湖帆词笺怆然有作》有曰：“痼疾癖烟霞，真手能不坏。”句下小注：“湖帆患风疾后，尚能作画。叶遐庵赠以‘真手不坏’四字，湖帆刻石章纪之。”

诗曰：“论交四十年，披襟吐肝肺。”“犹忆君病中，舌僵难言话。匆匆弃人间，解脱天刑械。”(卷二，十六页)这是隐指吴湖帆在最后，自己拔去输液管离世之事。

吴湖帆也是在去世十年后，才开的追悼会。诗集有一首1979年写的诗，诗题也长：《上海画院为湖帆举行追悼会，距湖帆之逝世已十一年。沉冤得雪而秘篋所藏俱尽，可不哀哉。往吊，悲不能胜。四十余年之友谊，恍犹在目前也》(卷十二，六十四页)

诗曰：“已伤劫烬家俱破，更惜埋忧骨亦灰。”“绝怜一代倪黄笔，点染江山不世才。”以吴湖帆比作倪瓒和黄公望，为绝代大家。

在诗的小注中披露：吴湖帆曾师事张謇，受到张謇的赏识。他晚年“患风疾，口喑，不能言者三年”。

1976年以后，“弟子俞子才、任书传诸人，为追念湖帆，集湖帆生前书幅展览”，曾函邀吕先生观览，先生有诗曰：“故人真个骑鲸去，忍忆嵩山旧草堂。劫烬堆中收故纸，寸笺尺幅亦琳琅。”

这些诗记载并透露了一代画师晚年的境遇。可供研究。我想，经过了那个时代的人，都会在这些诗句中读出自己的感受。

在诗歌中，先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，记载了一些文坛往事。比如，朱氏结一庐藏书(见卷十二，六十五—六十六页)。关于“结一庐”藏书，黄裳先生、沈津、陈先行、王世伟等同行、友人，都有文章介绍，此不赘述。而吕先生的诗曰：“遗经那及黄金重，可笑痴儿只癖钱。今日尽归官库度，胜他片纸散云烟。”这是他的见解。

在诗的夹注中，吕先生曰：“仁和朱修伯结一庐藏书七十余柜。多宋元刻本，后归丰润张幼樵。张氏后人不能宝守，现闻悉归上海图书馆。有感于书籍聚散无常而子孙多不见永守世也。”又云：“结一庐所藏宋元刻本、明钞本多清怡亲王明善堂旧藏及宋牧仲旧藏。咸丰庚申年，英国兵焚涇园，京师戒严，怡府藏书多散出于海王村。提银数两即可得善本多种。朱氏即于此时收得，后悉归丰润张幼樵家。”

幼樵，是张佩纶的字。张佩纶为张爱玲的祖父。那么，怎样归张幼樵的呢？先生曰：“传闻张幼樵系朱修伯之婿。朱氏歿后，张幼樵续娶李鸿章之幼女，所得奁资极富。朱修伯之子子清一官潦倒，张幼樵以廉价尽得其所藏，亦巧取豪夺也。”

到了张家以后，这些善本的结果如何？有些精品，如《花间集》、《陆士龙集》、《艺文类聚》等，张氏早已售出。”“后自北而南，几经迁徙，兄弟析产，争夺涉讼经年，然终没于官。”

藏书大家朱氏结一庐的书，经李鸿章之门辗转流迁，相当一部分，最后归到上海图书馆。吕先生的诗歌从他当时个人的角度，表达了他对这一流变的看法。这一看法是否准确，姑且别论。以上诗歌，映现了百多年时代风云的变迁，则是显然的。

综上所述，诗中所及诸事，景况各异，世间说法，也自纷然，可再探讨。诗中所涉诸人，当然并非都是完人。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，为我们的民族文化、为当今的社会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可谓当代中国文化苍穹一角的群星，明暗大小不同，但都在闪耀，引人仰望遐想。

吕先生的诗是个人的，也是这个时代的。

**中**国的诗，形态有变化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，从民间的国风，到官方的雅颂；从楚

辞到汉代的古诗；从古体诗到近体诗；从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直到近代的新诗。“五四”以降，胡适等人提倡白话“新诗”，传统的旧体诗在诗界的地位，显然衰退。但是，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，依然有很多人在用此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。文学的发展，不应机械地割裂为“当代”和“过去”。这正如美国学者韦勒克、沃伦《文学理论》第一版《序言》所说：他们“拒绝接受把文学分成‘当代的文学’和‘过去的文学’的观点。”(刘象愚等译，《文学理论》，三联书店，1984年，19页)我想，这是正确的。

吕先生的诗作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。那么，从古体诗“风雅传承”的角度来看，吕先生的诗歌有哪些特色呢？笔者认为，有如下三个方面：

**第一，具有鲜明的上海、或者说沪读文坛的地域特色。**

吕先生的诗中，显现了上海，尤其是上海市中心区域这一特定地区、特定历史时代的诗歌特色。

如，对于上海新雅饭店的变迁，写了好几首诗，讲到了新雅的变迁，反映了上海社会的实际变化。所谓“层楼掌故吾能说，闲依阑干数人过”(卷十四，七十一页)。

诗集中讲到在上海襄阳公园散步、复兴公园赏花、会友；还有到苏州的灵岩山扫墓，杭州、常熟、无锡的游览，凡此等等，荡漾在江南的湖光山色画面中，充溢着沪上文化的氛围，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没有在上海原来中心区域(原来的法租界、今复兴中路、淮海中路到延安中路一带)，在江南地区长时间的生活经历，是写不出这些带有鲜明特色诗歌的。

**第二，诗中多有名人地名。**

关于诗歌中引用地名人名的艺术效果，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，说：“狄奥尼修斯《属词论》首言诗中用人名地名之效。”又引述了李特(H.Read)《诗态》(Phases of Poetry)评论白朗宁(Elizabeth Barrett)等诗人诗句的论说：“此数语无深意而有妙趣，以其善用前代人名、外国地名，使读者悠然生怀古之幽情，思远之逸致也。”

在吕先生的诗中，虽然没有很多古代的地名、人名，但确实有很多现代的地名、人名。在诗集中，据笔者检核，涉及的各界人名有：

汪旭初、陈祺寿、张謇、徐森玉、叶景揆、任心叔、刘世襄、吴湖帆、陈从周、蒋天枢、潘景郑、王欣夫、谢国桢、周子美、王西野、胡道静、陈奇猷、金云峰、蒋雨田、夏幼达、蒋梦华、陈邦怀、章培恒、喻蘅、李庆甲等等。

不下数十人。

这些人，在当前看来，或许不一定有“使读者悠然生怀古之幽情，思远之逸致”的作用，但夹杂在诗题、诗中的这些人名，肯定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当时文化界、艺术界、教育界的氛围，映现出那个时代文化界的许多具体情况，个人关系乃至细微的情感。在隐约的文学话语中，可以领略时代大潮中，中国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变迁。随着时代而推行，或许就会越来越使人产生“怀古之幽情，思远之逸致”，展现出魅力。

**第三，呈现了当代旧体诗的新题材、新意境。**

这些诗作，虽说形式还是旧体，但显然已经超越了19世纪末到世纪初，黄遵宪“诗界革命”时代，“说西洋制度名物”多以“新词”入诗的阶段(钱锺书《谈艺录》三，23页，347页)。笔者以为，吕先生的诗，有些题材、场景是新的，意境也是新鲜的。比如《仙人掌花开喜而有作》(卷九，四十八页)，写“仙人掌”：“非草亦非木，既含难名状。仙人掌上花，丽色莫与抗。青黄鲜且妍，挺立无依傍。”不仅写花，而赏花之人“对花倾玉卮，酌以葡萄醪”。这当然不是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时代的“葡萄酒”。这诗中的题材、形象、意境，都是以前诗歌中未见，或少见的。

其他如《天津地震灾难创深》等作也是如此，表现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特定的场景，表现了先生独特的情感和生命力。

中国的旧体诗，在近代中国，其存在的形态，越来越纷然多样：有民众打油诗、通俗化的表现；有干部酬唱，抒发自己情感的形态；还有像陈寅恪、聂绀弩那样的知识分子，以诗歌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痛烈。可见中国的旧体诗，历经社会沧桑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，仍然生存着。如吕先生这样以大量的作品，汇集成《诗存》这样的形态留存下来，非常不容易，比较少见。可以说，在这些诗作中，中国文化的精魂仍存。吕姐所赠的《诗存》中，印有一方白文方章：“宗法西江第几人”，或许就是先生怀着某种自负的象征吧。

对于这样的古体诗，作为近当代文学的一部分，是否也可更进一步地做些分析研究，进一步展现、提升其生命力呢？

我们期待着。

(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。本文据作者在2018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二届“风雅传承”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充改写)